

（二〇一五年一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人物春秋】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	王文耀·王保春
【文革一幕】	九一三事件后我为黄吴李邱保健	李银山
【当事者言】	“休闲江青”与“毒药事件”	周淑英·赵柳恩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人物春秋】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

• 王文耀·王保春 •

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966年8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69年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继续当选。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因所谓赞成“天才论”而受到批判，被停止一切职务。1973年中共十大将其永远开除出党。自1970年10月起他即被关押，1980年底他又被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受到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被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8年10月刑满释放，被安排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工作。1989年9月去世，终年85岁。

一、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向我们下达一个特别任务

1981年7月10日（星期五）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室的尚同志来电话告诉王文耀说，邓力群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约王文耀和王保春同志，在下星期一的晚上7时去他家，有事要谈。并嘱托王文耀一定告诉王保春一起去。

7月13日傍晚7时许，我们俩到了邓家。邓力群带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互相寒暄几句后就转入正题。邓说：我受中央委托，转达对陈伯达的几点意见，建议由你们俩去看看他，做些工作，你们不要怕受牵连。你们去对他说：

1、在文化大革命中陈犯有很多严重罪行，中央考虑到他在文革前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所以在定罪时并没有把他所犯的罪行一一列上，只列举了那么几条。

2、他自己应该看到他与别人是有所区别的，他虽然是组长，但大量的坏事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干的，有些坏事他是知道的，有些坏事他不一定知道，就是知道了，他们也不听他的，他也管不了。这些中央是知道的。

3、他这几年给中央写的一些材料，有些是好的，但多数是为自己辩解的，这不好，应该正确对待自己。

4、这次在六中全会上，很多同志提出，要把他的名字写上去。中央考虑到要和以前衔接起来，对这些同志做了说服工作，未提他的名字。

5、他自己应该集中精力治病，把身体搞好。精力好时，可以看点书。那里没有的书，可以提出书名，帮助他借阅。也可以写点东西，研究点问题，如哲学方面的，这方面他比较熟悉。

6、你们帮助他情绪转过来，也可以对他有所批评，让他不要再为自己开脱了。

7、把身体搞好了，情绪转过来了，适当的时候，可以保外就医或者特赦。请通知他的家属，看望他的次数可以比以前多一些。

8、看他有什么合理的要求，可以提出来，他自己也可以写个条子转给我，报告中央。

9、你们把这个工作，可以向出版社的郭敬同志、社党委报告一下，只说我代表中央交代这件事，今后不止一次。也通知一下《红旗》杂志社党委，可不必细说。

在这个星期之内去看他。可找我的秘书刘中海，请他联系时间、地点。你们去谈后，再来谈谈情况。今天就是这么件事，请你们两位来。

根据邓力群同志的指示，7月15日上午我们去复兴医院向陈伯达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陈听了以后，表示感谢党感谢邓力群同志。他对我们说：“在你们来之前，我在想，见了你们怎么称呼，过去都称同志，现在我已判刑成了罪犯，再见到你们怎么称呼，想了很久，过去我们在一起都是老朋友，还是称老朋友吧。”在谈话中，起初陈情绪激动，后来平静下来精神状态较好，对自己的罪行不再辩解。

7月16日，我们将和陈伯达谈话情况写成报告，内容除向陈伯达如实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外，主要讲了会见情况：

我们讲了上述情况之后，陈听了情绪很激动，他流泪了。他表示：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宽大，我对不起许多同志。文化大革命我是有很大很大的责任的，是有罪的。文化大革命我思想一点准备也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江青的《纪要》，但她给我看以后，里面有些观点是我提的（那时我正在学习《共产党宣言》），后来毛主席批了。批的什么，我到天津才看到铅印稿。历史问题我不想多谈了，你犯了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让大家批判，批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可是当我看到报纸上对我有的批过头了的，也忍不住总想辩解几句。他说：我看到社论中点我的名时，我也想过是不是决议中没有点我的名，有人有意见，说对我太宽大了，所以再点一下，这也没有什么。

除此表态性质以外，他还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社会的就业问题

他说：最近我从报上看到社会上抢劫、强奸的案件很多，而且犯罪的大部分是青年人。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这种案子太多了，说明了是个就业问题。中国人口多，现在提倡计划生育，我赞成。恩格斯也说过计划生育。但人已经生出来了。就要解决就业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资本主义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量，把工人当牛马，而社会主义是逐步减少工作时间，剩下的时间搞学习和其他。马克思这些话使我想到30年代我在苏联学习时期，那时苏联刚打完内战，人民生活并不好，是很苦的。社会上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当时斯大林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社会秩序也还不错。那样艰苦大家都坚持下来了，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比他们那时好得多。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我看可以试试。以后还可以减到六小时工作制，有计划地搞，这样年轻人有了职业，有工作、有学习，也就有了奔头了。不然，年轻人没事做，晃晃荡荡，犯了罪光杀不行。我不是不主张杀人，杀少数可以，杀多了不行，他不怕了。1957年我在天津做调查，除调查工业外，还到不少工人家中做调查，我

问过很多家属，他们全家，能工作的都就业了，这是普遍的。每人薪水虽然低，但全家合起来就多了。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业多了，薪水不一定多。这样大家都有工作，社会也会安定。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所以特别给你们讲。搞街道集体所有制，我不反对，但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缩短工作时间，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讲过。我觉得社会主义有两种必要劳动，一种是生活必须，再就是留下来的资金不叫剩余价值，也叫必要劳动。这个对工人说是可以说得通的。

（二）迫切要求做些工作

他以迫切的心情说：你们告诉党，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想做点事，写一些东西。五几年我先后在上海、天津、常州做过一些经济调查。常州那里有不少先进的东西，报纸上怎么没有见报道。对这些工作我很有兴趣，想继续做下去。再就是全世界就有一本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的老工人都快死光了，为了教育后代，我想写一本解放前的中国工人状况，对教育后代有好处。不能“数典忘祖”呀！当然就我一个人不行，得要有几个人，把解放前的工人遭遇记录下来。这个工作我是很愿意做的。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我想到的有中国史问题、中国文艺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看了鲁迅的小说史对我的启发，想写一两本小说的历史。想到这些我就着急，我已经被关了11年了，不能总是关着，不能做事呀！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如果可能的话，给我100块钱，我想吃点水果。因为我大便不好，大便拉不出，人很难受。

除以上书面文字外，我们主要是口头汇报。

当我们汇报完以后，邓力群同志说：下次你们去时，可以明确告诉他，治好病以后，不一定再回监狱，将来考虑一个适当的地方加以特赦。让他注意报纸上的一些理论文章，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写个短信。

他以前写《中国工人阶级概况》时，陈贞、姚洛参加过，不知姚还愿不愿意搞，可以问一下姚洛。原稿在什么地方？以后可以给陈看看。

邓力群说，你告诉马仲扬，问一下陈伯达的钱是否存放在《红旗》，如不在，可以先暂借三百至五百元钱，交给你们（王保春、王文耀）掌握使用。

他的小孩子（陈的最小儿子）每月25元，可以再加10元。

今后你们可以轮班去，两个星期一次，时间不一定很长，半小时至一小时。回来后我们通气。我让刘秘书，通知公安部，还给陈烤电治疗。

你们下次去，可以问问他还有什么亲属，能够照顾他的生活。

7月21日上午接刘忠海（邓力群秘书）电话：1、你们和陈伯达的谈话记录已经看到，里边谈到邓（力群）的可以不提，建议再整理一个简要的记录，便于向中央反映。2、领款问题，力群同志已与高登榜同志联系过，你们可到管理局计财处，找石同志（一女同志）联系。

我们接到市公安局同志的通知，于8月5日下午去友谊医院看望陈伯达一次（他是4日下午被从复兴医院接至友谊医院的）。住在医院的三楼西头，条件不错。病房内有两张床位，有沙发，有卫生间。由市局一位同志暂时陪住。医院规定病员不能听无线电广播，报纸由于刚去还

没有订上。我们从中办财务处代他取的1000元钱，让陈办了手续——写了取款条子，从中取出100元交给陈零用，其余我们代为保存。当时我们为他买了钢笔、墨水、手纸、肥皂、布鞋等日用品。

我们向他传达了上次见他后向上汇报时，力群同志的指示精神：1、陈现在首先是治病，不再回监内，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2、让他注意报纸上有关理论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写个条子也可以。他听后再次表示非常感谢党。

他谈了以下几件事：

一、关于刘叔晏：1、刘叔晏搞某某同志的专案是打着我的名义搞的，所以这个错误第一应由我负责，第二才是她。2、她为什么被江青送到山东去？是由于刘叔晏从专案中搞到了一份康生的材料，她以为抓到了康的把柄。我把这件事无意中告诉了江青，谁知江青与康生关系那么好。江青要这个材料，刘死命不给，江青就报复把她赶出北京。1968年刘叔晏逼我给她写了离婚书，我写了以后，她又不走，我向她要离婚书她也不给，说她留着有用，她预计到我是倒台的。尽管这样，她的错误我应该承担的，还是要承担的。现在我觉得把这两件事说清楚，为她开脱一下。

二、十几年了没有上街，我从复兴医院来到友谊医院时，看到大街上的人很多，我觉得大城市的人太多了。报纸上也讲了要发展小城镇，这很好，很科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也是反对大城市的。他以蒸汽机为例，说自从蒸汽机出现以后，就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可以制止大城市的发展。

三、我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讲电子工业的，这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但这篇文章只是讲工业管理问题，而没有讲电子工业的发展对整个工业发展的作用。6月8日我写了一篇，给那里常和我接触的那个同志看了，他和我的看法不一样，看完后又还给了我。我给你们看看，是否可以这样写，如果可以，我就把它抄清一份。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

我们让他现抄出来，也算是对发展工业的一种看法吧。

我们劝他好好治病，他说：不好治，精神好了，就都好了。

二、转递陈伯达写的材料

8月12日，我们给邓力群同志写信，汇报如下情况：8月11日陈伯达通过陪住的李玉元同志（经过市局同意）通知我们去拿他已写好的两篇材料，并让我们转呈给组织上参考。陈现在医院里，改名叫陈健相，暂时由李玉元同志陪住。李玉元同志是去年退休回家，由他儿子来《红旗》杂志顶替工作。陈在住院期间无人照应，市局和《红旗》杂志社党委共同商定，从河北完县将原在陈处工作过多年的李玉元同志接来，暂时照顾一段时间。陈晓农从石家庄来京，去医院看过陈两次，现已回去。

并附上陈写的材料三份：1、试说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问题；2、恩格斯论述“工业发展和城乡融合”的问题；3、马克思对生产资料的提法杂抄。

此文送上后，8月14日邓力群同志批示：复印几份，一份送耀邦同志，一份送乔木同志，几份分送润青、梅行、子力、有林等同志。

8月27日，我们去医院看陈一次。次日，我们写信给邓力群同志，告知情况：陈对生活、治疗都较满意。再三表示感谢党对他的宽大。陈提出想看一些公开出版的杂志（经济的和哲学的书等），我们觉得可以给他买一些这方面的书刊。这样可以使他了解目前发展着的社会，因为从谈话中看，他对社会太生疏了。

同时附上陈摘抄材料三份（略）。力群同志看后，9月16日批示：复制几份，分送耀邦、乔木、玉青、润青、梅行、经济组、理论组和我各一份。

9月15日下午，我们把陈伯达所要的书（马恩选集等），给他送去了。陈问对他的财产（包括1万多元钱；三次出国穿的皮大衣等衣物；书，有些是旧版书，如二十四史、《文选》抄本等）如何处理。并说，乔木、力群等同志都是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如果可能，我很想听他们的讲课，学习学习。9月19日，我们将以上谈话摘要，写信向邓力群同志汇报。

10月1日晚，我们去邓力群同志处，他问了陈的病情、治疗情况怎么样。我们向他汇报了陈的情况后，力群同志谈了几点指示：

1、可以找医生谈谈，听听医生的意见。同时可以告诉医生对他的病能治疗好的，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尽快治好。现在医院的条件总比复兴医院要好嘛，不要采取应付的办法。治好了不光他度个好晚年，还可以为人民做些工作嘛。你可以对医院说这是中央的意思。

2、他那几份材料，都印制了，已送给耀邦同志、紫阳、先念和有关同志了。

3、他要研究“中国工人状况”的事，过去那些材料在姚洛（注：姚洛曾任陈伯达的秘书，后调到《红旗》杂志国际部任部主任）那儿。陈将来编这本书，可能还需要写《中国工人状况》的吴成民参加。如果这本书编好了，也是一个贡献。

4、我们说：陈伯达说他有两件事他对不起主席：（1）是不应该推荐田家英去他那儿；（2）是田的哥哥在台湾的事儿，事先不知道，事后未报告。邓力群同志说：主席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5、（保春说：我们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您要随时提出来，不要做错了，又要……）那不会的，有我替你们说话，这是中央交办的。

另外，力群同志说：马洪同志问我，王学文同志问，他的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整理出来之后，社科出版社能否给他出版。我说只要你整理出来，是可以出版的。这本书估计印数不会太多，因为青年人不熟悉他，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都是他的学生，他在延安讲过课。他是我们最早讲政治经济学的，是第一个。所以趁他还健在给出版好了。

11月23日，陈伯达从医院出来，迁到团结湖居住。下午我们去看望陈，他写了个材料交给我们，希望转呈上去。力群同志批示：复印几份送耀邦、乔木、润青、梅行等同志。

1981年12月16日晚8时许去探望邓力群同志，他谈了两件事，同时提出让调晓农来照顾其父亲。邓说：告诉他（陈）写的材料都复制了，除送耀邦同志外，还分送给主管的同志。陈除了谈到想整理中国工人阶级概况，还有什么打算？下次你们见他时转告他，我建议他集中力量先办成一件事，如有精力再做第二件事。请姚洛同志将稿子送给陈伯达，他如不想去，把稿子交给你们带给陈。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应该计划一下，先做什么，一件一件完成。现在不像过去有人帮助，都要自己去干。

1982年3月3日，我们给邓力群同志写信：“呈送陈伯达写的学习笔记（节抄自马克思的著作）《工业技术基础的发展过程》一份。”3月20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向一些领导同志推荐这份材料。

4月23日晚，陈伯达去西绒线胡同周扬同志家中，去看望周扬同志，由市公安局同志陪同去。此后据说两人（由苏灵扬、露菲陪同）谈了约4个小时。

5月14日，我们俩去陈伯达住地取回三个材料：1、《读〈儒林外史〉杂记》；2、《读〈三国演义〉杂记》；3、《西游记》（未抄写出来）。陈说：前次送的读《红楼梦》笔记，建议周扬同志看看，能否用笔名发表。

5月21日，我们给力群同志写信，说到陈“现在写了几篇文学方面的文章，现送上《读〈儒林外史〉杂记》和《曹操与“青州兵”》两篇，现在他正在写出《西游记》读后感的文章，不日即可以完稿。他希望这两篇连同前次送上的《〈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能否用笔名发表，同时在发表之前，送周扬同志去看看，因为他在访周扬同志时，曾谈过此事。不知可否，请酌定”。

5月28日，我们再次给力群同志写信：“送上陈伯达写的一篇文章《求知难——记读〈西游记〉》。他说这篇连同前几篇，都是他在学习文学评论而写的练习作。建议是否能分送乔木、周扬、胡绳同志阅，请力群同志酌定。”

6月23日晚，接萧清河电话，让我们去一下，陈最近又写了个材料待抄出望转送上去。我们去取回。（按：取回的是陈伯达一篇旧杂感）7月12日，陈晓农送来他父亲近期写的一份材料《认识的渐变与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的顿、渐两派》。

8月17日下午，陈请萧清河同志来电话通知去取陈伯达交给的一篇文章——《〈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杂记》。王文耀去取时向陈说了周扬同志看了他的文章，觉得很好，但是总归多年不接触外界了。然后陈谈了以下一些意见：1、我是看到报纸上对报考大学的反映等，我才写了《儒林外史》等评论。这不是新的科举制度吗？这个比旧的更厉害，年龄只能限制到25岁就不能报考了。2、对包产到户，这是大事，刘少奇过去也不同意搞，如托拉斯等。现在可以搞。小农经济是可以搞起来的，美国就是，现在美国农业居世界首位。其实苏联也可以搞起来的，只是他们政策错误。农业到户这是大事，发展是无情的！3、发射卫星是我在新建胡同向张震寰和科学家建议的，向中央写了报告。也就是1964年1965年，那时我刚正式调到他们那里（国防科委），我的意思是搞天上的，是为了地上的，是把电子工业组搞上去。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会议上说过，我是关心卫星发射的（除总理外，别人不知道）。4、1953年和张春桥、李友久向主席汇报时，会前我随便说了河南有的人向杭州用机器换农产品，我说，这不是产品交换嘛。后来主席郑州会议上批评我取消商品、货币等，我哪是这样说了，这是误会。但主席还是用我。

陈还说：我写了这篇《〈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杂记》，你们看看提提意见，我每一个字都仔细斟酌推敲了，都是有意思的。你们看了提出意见后再上报。

9月30日，我们俩去看望陈伯达，他写了两份材料，托我们转报中央。即《儒法两家其实是兄弟》《科学、假设、实践》。

10月30日晚上我们俩去拜访邓力群同志，谈了约一个小时，邓说：他写的那些东西，都给中央的同志看了，有三篇文艺方面的（有关《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西游记》的）我交给了周扬同志处理，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他没有告诉我。其他的都是我经手处理的。有的打字，有的铅印，都分送给中央有关部分同志看了。其中有一篇（想不起是哪一篇了，较长、是佛教……题目想不起来了）大家较注意，觉得写得好。这些文章的底稿，将来原稿退给他保存。

我让他们清理一下，有原稿退给他原稿，没有原稿可退他一份清样稿，留做自己保存。他这个人就是私心太重，情绪时好时坏，也就是私心的关系。过去就是因为这个栽了这样大的跟头，现在还是这样想就没有人管他了。他写出的东西有人看就不错了。他现在要想到自己是个犯人，和过去不同，那时是第四位，写的东西不管怎样，还登在主要位子上。

1 1月2日，我们去看望陈，将邓的指示向他传达，并将带来的几种杂志交给他看，他很高兴，特别是他写的文章《求知难》在《读书》杂志第10期上发表了，他非常兴奋！表示要多写点东西。

他让我们作为私人关系，向邓力群同志提出：《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有关“合作”的提法是说：“列宁没有说过”不妥，请注意；关于“竞赛”“竞争”的提法，还是“竞赛”为好，列宁也提过。

1 2月2日晚，去看陈，他说准备写一篇“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文章。另外他谈了过去他写过个决议案（大约是经过1963、1964、1965年调查写成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其大概内容有中央、地方的工作的合理布局等（记不清），说：此议案在常委会讨论过，参加者有：主席、少奇、周总理、邓小平、陈伯达。讨论前主席看后很高兴地对陈说：“这下我们搞工业就有个明确的路子了。”兴奋之中还请他一起吃了饭。但在开会讨论时，主席问大家怎样？首先邓小平说：“不行，还不成熟，不是以钢为纲”。经他这样一讲，主席没再说话，就被否决了。另外他深有委屈地讲：八大决议中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提的，这没错呀，列宁讲过的呀，是在《列宁选集》三卷811页，还是在第四卷，你们查查看。（注：此文即《工业问题》，1963年开始起草，修改稿写毕于1965年8月1日）

1 2月31日，我们去看望陈伯达。他的《论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已经完稿，待抄清以后再呈送。陈得知周扬同志不慎跌伤，表示慰问，希望他以后别服用安眠药了。

1983年2月4日，陈晓农来社科出版社讲他父亲生病发烧住进了公安医院，让我们去医院看看。当时王保春已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王文耀即随陈晓农去医院看望。晓农讲可能前几天他写论事物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文章，有些紧张，晚上睡得太晚，夜里起来小便有些着凉。陈伯达对文耀讲了他写论事物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文章的情况，他说：“呈送时可说，我写完就病了，没有再看，如有错误，请批评指正”，将文章交给了王文耀，并再三交代：“你和保春仔细阅读一下，逐句推敲。向我提出意见和建议。”

3月4日下午，去团结湖陈伯达家里看望陈，并将陈曾写的部分（8批）报送中央的文字材料原稿，经中央负责人看过后，现退回，让陈自己保存（都有中央领导亲笔批语）。

4月15日，我们给力群同志写信：“送上陈伯达写的《读一篇农村调查》，请阅处。”

4月26日，保春接到刘忠海同志电话，传达中央领导指示：1、陈伯达写的材料，中央领导看了，建议他多写一点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东西。尤其是近代史当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这方面他比较熟悉，有些是他参加写作的。这样的材料对后人很有用处。可长可短。2、不要总写读书笔记。3、写现在有一定困难，因为他对外边的情况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太少。又看不到文件、材料。4、研究一点历史的重大问题。

三、陈伯达失去递交材料权利

1983年7月21日，我们俩去看望陈伯达。主要是中央有关部门让他写有关“九大”前后和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情况。还有关于延安“鲁艺”和中国文学当中的问题。他让我们去看看他写的这些材料，我们看了以后，帮助他回忆了几件事，做了补充。然后，他交给我们一篇他已完稿的《文艺的魅力》的稿子。

8月16日，陈伯达通知我们去他那里，主要是谈前妻刘叔晏送给他的几本书如何处理的问题。谈完此事后，接着说他对目前农村政策很犯愁，他说：农村个人劳动目前好，将来不好办。中国以农为基础，基础坏了，其他不好办哪，党风不正主要在基础，都为自己，如何纠正。马克思说英国是小农经济发展起来的，我说美国也是。农业的情况我了解一些，看了不少材料（报刊），这里（指工作人员）有人家就在农村的，关键是个体劳动，将会两极分化的。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经过艰苦的劳动，找出了社会发展这条科学的规律，预见到将来，这没有错。

谈完之后，他交给我们一篇写好的稿子——《关于新陈代谢》。

9月23日，我们收到刘忠海同志的信，里面说到：“前次我已打电话给你们两位，转告陈：中央同志希望他写一些有意义的回忆材料、文章，少写些评论感想的材料，还是请同他谈谈。”

9月底的一天，刘忠海同志通知王文耀去他办公室一趟。刘对文耀说：请你来，有两件事告诉你，第一件是，1983年9月26日陈晓农给中央负责同志写信，要求从他父亲的存款中取出1000元钱来，以购买父亲的一些衣物、被褥。老邓（力群）已批同意了，请你拿去办理。第二件是，陈伯达有一篇文章，在内部刊物上给登载了，稿费交给你。这是80元钱，不要告诉他是什么钱，这些钱和申请要的那些钱放在一起，不说是什么钱就是，免得他知道了对别人乱说，引起别人的意见。另外刘说：前些天送来的那件材料，也已送去排印了。并说，中央很重视他的东西。刘说我上次给你们打电话，说让他今后多写一些有用的东西，不要写什么杂记呀，感想呀什么的。因为他也不了解中央和地方的情况，写那些都是些不赶趟的东西，没有用，白浪费时间。他应写一些过去中央的重大事件等回忆录。这些对中央对后代有用处，因为有些是他经手和参加了的，别人不知道，不写就完了。这是耀邦同志看了他写的东西以后说的。这样老邓（力群）就叫我告诉你们俩，跟陈好好谈谈。让他不要再写这些了，应写写我上边所说的那些。

11月18日，我们去医院看望陈伯达，他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1、局里（市公安局）同志问我开始整党了你有什么看法，我说：很好，鉴于过去的教训，步骤要以自我批评为主。当然自我批评也会有假（如1942年时有的说自己参加了红旗党，结果都是假的），不过以后都是可以慢慢落实改正的，总比乱批好。

2、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感谢你们。我被关了14年了，我这么想，如果上边不找你们，你们不要为我去找上边了，不要连累你们，因为你们约了这么长时间都不见，不知有何变化，今后如不方便，可以少来看我，因为现在开始整党，以免影响你们。

3、想看看我的《反动言论集》的第一册。我过去写的这些文章自己都想不起来了，而这个集子收得这样全，这是江青一大功劳，我要感谢她。但第一集是些什么，我想看看，后边几集也想看看。五顶帽子的根据，想看看，不方便就算了。第一集可能是我入党前写的，那时还是小孩子，不过我想也是比较进步的。将来再印还可以用这个名字，“叛徒、特务、托派、国民党反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还应加上“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或者标题是“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副题为“叛徒、特务、托派、国民党反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说实在的，我年轻时（入党前），想的就是两件事。一是想搞文学，当文学家。二是想谈恋爱……所以说，我青年时没有野心想当官。”

4、最后我写了一个《试谈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比较长，有机会请你们看看，什么时候往上送，送不送，再说。工业我已经写了，送的那个《〈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杂记》就是。我有话不写出来也不好，不好受呀！

5、周扬他讲那个干什么？太不慎重了，随便讲，那么多大问题不讲，如生产关系、生产价值等等。所以说科学的东西千万不可随便讲、乱讲。

1983年11月20日晚，我们去邓力群同志家拜访他，他与我们谈到：

邓：他现在看书多吗？

王：看书多，没有别的事，几乎整天看书。他对这次整党，表示很赞成，说主要应以自我批评为主。

邓：我看到他的反映了，决不像他们那样整人。这个人让他多活些时候好，让他看看这帮人干得比他们那帮怎么样？他对邓小平同志意见很大，我是知道的。是怎么回事呢，1963年不是有个关于工业问题的决定嘛，送主席以后，还当着他的面，主席问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讲，还不成熟。吓，后来他很有意见。他这个人哪，在顺利的时候，他不找我，在他不顺利的时候，他就找我谈，想得到我的支持。他给我说这件事，我讲，这是党内常有的事，起草一个文件有的同志赞成，有的同志认为不成熟，不成熟再搞一搞不就成熟了嘛。可怎么说也不行。

王：在万寿路六所时那篇（一篇国际方面的文章，题目记不清了），他不就生气了。

邓：那时他对康生很有意见，他和康生是好朋友，我对他一直是好心，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我要是他早不理他了。

王：这个我们去看他时，多少他表示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有时情绪激动得流泪。

邓：他骂我骂得很多，有些事简直莫名其妙，我都不去记它。

邓：我到《红旗》杂志社，是他多次提出要我，后来搞到刘少奇同志那儿，少奇同志说话我才来的。少奇同志倒台后，他说我是刘少奇安插到《红旗》来，是夺《红旗》的权的。哈哈，真是莫名其妙！他骂我是很多了。骂我不学无术，但整理个记录还可以。这对我刺激很大。他有一件事是我不会忘记的，当然也不光是我了，就是到干校后，他对军宣队说：（1）这些人都是读书人，当然劳动是不可少的，但要给他们读书的时间；（2）晚上不要安排什么会议，由他们自己支配；（3）生活上安排好，他们大部分是南方人，搞一些大米什么的。这样我就很感谢了，每天晚上看两小时书。人家不是说不学无术嘛，自己就学一点嘛！这一点还是很感谢他的嘛。也希望这个人能多活几年，看看我们这一班人比他们那班人干得怎么样。

1984年1月4日（农历正月初三）我们去给陈伯达拜年。我们告诉他《试谈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已于11月20日送上，还无反映。

3月24日，我们给力群同志写信：“送上陈伯达写的文字两篇：一，《人类儿童时代闪耀的科学微光》；二，《过海的故事》。据他说第二篇是他的亲身经历，内含自我批评之意。陈说，由于整日坐屋里，长期脱离外界社会，情况不大了解，今后政治方面的东西基本上不写了，如果精力可达，写一些偏重于学术方面的东西。不妥之处，望指正。”

3月30日下午，刘忠海同志给王文耀来电话谈到以下情况：

你们转来的两件材料收到了。耀邦同志看了有些生气。你去告诉陈伯达，让他不要写那些现实的事情，他不了解情况，观点都不对头，是错的。不要像“四人帮”那样引用那么多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白浪费大家的时间。因为他写的东西送来，这里要打字、排印等等，花很多时间，文件、事情又那么多，看完之后，又没有什么启发。他那么大年纪了，没有多少时间了，费那么大的精力写出来，大家又花时间去看，又没有什么启发。因此，请你去告诉他写一

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回忆。他在主席身边，比如，在西柏坡开了一个什么会，研究一个重大问题，都是谁参加的，主席是怎样说的；如在延安对一个重大问题，主席是怎么说的，都是谁参加的；等等。这对他来说是很多的，别人是不知道的。他写出来对后人很有用处。不是要他写什么交代材料，也不是要他写分析意见，而是写出那些事实就行了。为的是对中央对后人留些有用的东西。

简言之：

所转东西收到了，胡不甚满意，请转告他：1、不要写现实，不了解外界情况，观点不对。2、不要引那么多经典，太费时间。3、写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留给后人，这对陈是不难的（如西柏坡、在延安等研究重大问题，都是谁参加、主席是怎样说的等等）。4、不是写交代材料，是写出历史真实，不加分析意见。5、要珍惜他的时间，年纪大了，时间不多了，要写些有用的东西留给后人。

（4月17日文耀到一位同志家做客，听说：陈写了一个农业方面的材料，邓小平看后，很生气，和当前形势不符。不知是否是真的。看来和上面所接电话在生气的人的姓名有出入，也许两人同时生气了，也很难说。）

1984年5月25日下午，邓力群同志秘书刘忠海同志给王保春来电话说：“力群同志让我通知你们两人，从今天起不要再与陈伯达联系了，也不用对陈做什么工作了，到此为止。”他客气地问我们好，有无什么困难？我们只是客气回应一下，但心里想不知出什么事了。

接此电话以后，我们与陈的政治联系到此为止。他所写的材料，如要上报，也只能通过看护他的公安人员传递。从此，我们历时三年与陈的公事交往就此结束了。

以上是我们收集整理的一部分材料。2005年，我们看到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中有一段话：

为陈伯达写的材料，胡耀邦对我责难

我到杭州以后，在下一个星期一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陈伯达写的材料，说：陈伯达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引用列宁的话来教训我们，这样的事情是邓力群干的，邓力群不能这样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来以后，要和他谈这个事。乔石出来说：王力出来以后，表现疯狂啊！

为什么会出现陈伯达写材料的事呢？这里需要回溯一下。处理“四人帮”问题的时候，王力、关锋免于刑事处分，从拘留所放出来后回家了。陈伯达是保外就医，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几个人出来了。他们以前是做文字工作、做研究工作和写理论文章的，出来以后，还可让他们继续做点研究工作，写点文章。你去和他们联系一下。胡耀邦这样安排是好意，我当时就问胡，以什么名义去和这几个人联系？胡耀邦说，代表中央。这样，我就找王力谈了。王力这个人不安分，给我惹了一些麻烦，先不去说他了。至于陈伯达，我就想到“文革”中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最使我讨厌的是，他那时每次去《红旗》机关，都要问邓力群死了没有。因此我对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来的两个秘书王保春、王文耀，让他们去与陈联系，转达中央对他的这个意见，说明他出来后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为党做点事。后来，陈伯达陆陆续续地写了些东西，有些东西属于小品，有些东西还有些看法。其中几份，我还交给了周扬，让周想办法处理一下。有一份讲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我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化名送给辽宁出版了。大约是1984年春天，陈伯达送来一份根据报纸材料写的东西。那个时候，对重点户、专业户进行贷款资助，陈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然后说：根据列宁的主张，对合作化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而我们现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个体户。陈伯达

认为这违背了列宁的教导。以往陈伯达送来的东西，都在小范围里给几位同志看看，都没说话；而这份东西我没看，当时我正帮邓小平同志准备中全会的材料，也照样送给有关人看，胡耀邦看了后就发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陈伯达写的材料时，认为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气了，就忘记了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

那次会议，书记处研究室苏沛列席旁听。我那时在杭州，他就来电话说：胡耀邦发了脾气。乔木也为这事为我抱不平，他说：看来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乔木好像要为这事写信，那时陈云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这时正好《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关于富民政策的文章。乔木对这个富民政策也不满意，想就这个问题给胡耀邦写个意见。原来乔木想三个人联名（他、我和陈云）写，陈云同志在党内有经验，说：这个形式不好，好像我们三个在外地的人，联合起来给中央提意见。这样就没有联名写信。乔木是想为我说话，我说，你不必这样做，我自己会写信的。

我从杭州回来后，就写了封信给常委，其中把这些事的原委都讲了。我还把胡耀邦当时委托我去做事的原话都附在信后面，使常委都知道这事。胡耀邦看了信后说：是不是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议论一下这个事情。陈云看了信后，做了如下批示：邓力群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以后对像江青、王力这样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511页）

□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12期

~~~~~

## 【文革一幕】

### 九一三事件后我为黄吴李邱保健

• 李银山 •

1971年我35岁，任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医院一所所长。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按组织安排，我成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保健工作组组长。这次特殊的任务历时五年三个月零六天，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一段永远难忘的日子。

#### ◇ 上课途中紧急召回执行任务

1971年9月23日是医训班开课第一天，按计划我要给学员们上第一课。一早，我正走在通往教室的路上，听到后面有人喊：“李所长，首长有急事叫你马上回院部。”一回头，见喊我的是院部通信员，我转身快步向院部走去。

来到院部门口，我稍做停顿，喊过一声“报告”，只听院办公室立刻传出“进来”的声音。我推门进去行了个军礼，见师政委陈宪达提起公文包和院长余立基正站在桌边。陈政委对我说：“叫你到卫戍区执行个任务，外边门口有车送你到卫戍区门口。”余院长插话说：“讲课怎么办？”陈政委非常严肃地说：“如果没有人顶替，讲课先停办，解散。”我意识到事情紧急，二话没说，转身到门口上车走了。

车行驶进卫戍区大院，我刚一下车，一名干部模样的人就走上前来，只说了三个字“跟我来”，然后我就被径直带到地下室宿舍。这时，听到他对我说的第二句话：“现在首长没有时间，有时间再跟你说。”说完就关上门并从外边把门锁上走了。

入伍多年，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当时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反复思索他说的话，想的是自己不过就是一名普通医生，也用得着这种形式？一切发生的这么突然，到底出了什么事？什么大事？

晚上7时，有人给我送来盒饭，炒菜里还有肉。吃完饭，我把门从里面插上。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出不去，外人也别想进来。我当时的誓言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不管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坚定不移。

#### ◇ 看到绝密文件知晓九一三事件

当晚23时50分，听到外边敲门，我心跳加快，眼睛盯着墙上的挂钟，一动不动。接着，第二遍敲门声响起，同时有人叫：“三师医院李银山所长。”我答应着开了门。来说：“首长有事叫你去，跟我走吧。”于是我跟随他来到三楼首长办公室。一进门，见并排坐的两位分别是卫戍区吴忠辉副政委、邱巍高副司令。我行过军礼，应首长要求坐下来。我注意到邱副司令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尽管这丝笑很快就消失了，我的精神还是从高度紧张状态稍微放松了些。我想他一定是认出了我，因为我曾经给他做过保健医师，在河北滦南县四清时，还给他当过两次临时警卫员。这时，邱副司令叫外面的李秘书进来打开保险柜，取出文件启封后递给首长，然后又叫李秘书到屋外并关上门。邱副司令对我说：“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出于工作需要，同意给你传达一份文件。”当读到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叛国出逃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机上九人全部摔死时，我着实吃了一惊。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我党历史上重要的九一三事件，因那份文件编号是57号，就简称中央57号文件。这时，吴副政委插话说：“知道你没有思想准备，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中央一份绝密文件，现在只有大军区司令员和三师师长、政委知道。”然后又非常严肃地说：“要是泄密就杀头。”读完后，邱副司令叫外屋的李秘书进来，把文件重新封好收入保险柜，之后又送我回原来的地下室宿舍，门还是从外边锁上。

重新回到宿舍，我的精神已不再那么紧张，转念一想，组织叫我来肯定不是仅仅看文件，那么需要我做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 ◇ 接受任务，负责黄、吴、李、邱保健工作

第二天早饭后，有人把我从地下室宿舍带到司令部会议室，邱副司令交代任务说，要我专门负责黄、吴、李、邱的保健工作并兼任组长。纸笔放在桌上，给我一天时间考虑。直到下午4时，桌上的纸笔均未动过。这时邱副司令进来，第一句话就问“想好没有”？我回答：“想好了，坚决服从命令，保证完成任务。”首长说：“如果没问题那就下楼，门口有车送你到东风小学下车，步行走军营南大门，直接去看守组，由张师长直接领导。”

到看守组后，我第一时间了解了黄、吴、李、邱四人的健康情况、既往病史、慢性病的治疗和所服用的药物等，调用了有关人员住院检查、诊断、治疗病历，为其分别建立了病历档案。

看守组包括我在内一共六个人，要求24小时食宿在一起，一日三餐都由师部食堂供应，不准一个人单独出去，不准回家，不准回工作单位。同时要求工作务必细心认真，要有高度责任感，有事要及时请示汇报。

当时邱会作在师部看守所，由我一日两次测体温、量血压、询问大小便情况。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则分别关押在各团看守所，由各团专职医生负责日常保健和健康监测。

刚到师部不久，邱会作发高烧，体温达到40度，头痛、咳嗽、胸闷，精神萎靡不振。我亲自给他采血化验，做心电图检查，并向中央专案组汇报病情，请求会诊。上级专案组回答是：“要活口供，全力救治，没有合适人选参与会诊。”此时我不仅思想压力大，责任压力更大。事

已至此，我就凭借当时有限的检验结果，结合多年下的诊疗经验，按肺部感染确定了治疗方案，输液、打针，加口服药都是自己操作。

在看守组里，所用治疗药品都是从中南海专案组领取，在原药品包装上加有密封条，密封条有破损禁用，启封要两个人同时在场，给患者用药也要两个人核对，药名、剂量、时间都有详细登记。

在邱会作病重期间，我一直守候在他身边，连大小便都是我帮他，并做好记录。基于我对患者病情的准确判断和正确施治，再加上精心护理，邱会作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体温逐渐下降到正常范围。五天后，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我也深深出了一口气。

#### ◇ 送邱会作接受中央专案组提审

看守组前四周的工作比较紧张，一次张师长传达上级指示，要求看守组百倍提高警惕，如有人车强行闯进看守大门，就开枪射击，看守人员两人一组，每四小时轮换一次。白天邱会作一个人写检查或看书、看报。看守人员会记录他每顿饭的饭量，上厕所的次数以及晚上睡觉时间、睡姿和翻身次数等。

在中央57号文件传达前中央专案组经常来审问，还先后三次到北京航空学院提审。当邱会作第一次接到提审通知时，对看守人员说：“我找医生，身体不适，心慌、胸闷、肩痛抬不起胳膊。”我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即刻给他做了心电图检查。做完后我说心电图正常。他说：“我也懂心电图，给我看看。”我顺手把心电图递给他，他倒拿着手里的心电图看了一分钟，说：“我看还有点问题。”我说：“倒看有问题，正看没问题。”我把心电图肢体导联，加压肢体导联，胸前导联都标得很清楚，并把做心电图的年月日时分写好，结论心电图正常。

三辆吉普车停在看守组门口，按原计划时间准时出发，张师长在前带车领路，我在中间车上，后边车是持枪安全保卫，三车间距离要求50米。当时从师部到北航路上行驶时间约一小时。中间车上，除司机外，前排副驾驶位置坐的是作训科参谋，手持冲锋枪，后排坐三个人，左边的是作训科科长，中间是邱会作，右边是我。到达目的地后，张师长带邱会作到中央专案组审讯室，其余人员则到旁边休息室等候。审讯完毕，我们一行人又由原路返回。

#### ◇ 专案组充分肯定保健组工作

1971年10月20日后，中共中央57号文件自上而下传达。对我们工作的要求也有一些变化，要求以看守组工作为主，有事随叫随到，白天可以回单位做日常工作，晚上可以回家。

在团看守所的黄永胜，患慢性肝炎、肝硬化，长期服药治疗。1974年11月的一天晚上，黄永胜吃了两个鸡蛋，夜间表现有些烦躁，值班员问他“有什么事吗”？他只说：“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第二天早晨，黄永胜行为异常，把裤子套在头上，随地便溺，精神错乱，沉默寡言。值班人员认为是他故意做出的。我了解情况后，马上到团看守所，了解病情，检查病人，根据头天晚上吃两个鸡蛋，有重度肝病史，患者所出现的症状进行性加重等现象，初步诊断为“肝昏迷”，并据此进行了初步的治疗，同时向中央专案组及时做了汇报。后来，送黄永胜到医院做血氨检查，测得数值高于正常值四倍，数据验证了我的判断。中央专案组对我第一时间作出肝昏迷的正确判断给予了充分肯定。

到看守组工作以来，张师长每年除夕下午都要带我从位于顺义的师部去各团巡视座谈，听

取意见和要求。有一次到某团看守组，师长一进门就坐下了，我站在师长的后边，吴法宪站起来顺手把他身边的一把椅子搬起，向我这边走来，我随即迎上去接过椅子。经过几年的相处，看守组和黄、吴、李、邱已不像刚开始那样拘谨。

#### ◇ 送黄、吴、李、邱抵达秦城监狱

1976年12月30日下午，接到中央专案组通知，黄、吴、李、邱晚8时入狱。

晚饭后邱会作把自己所有东西收拾好。晚7点，三辆吉普车晚8点30分按时到达秦城监狱。

下车后，已有工作人员在门口等候。随行工作人员给他提着东西，通过约有一百米长的走廊进入狱室。狱室大约八平方米，在两米多高处有一个带铁护栏的窗户，室内有一张约40公分高的单人平板床和一张小桌子。随行工作人员把邱会作的个人东西放下，与狱中管理人员进行物品交接。

物品清点登记完毕，双方签字后，监狱工作人员宣布了要严格遵守狱中各项规定的具体内容，并抽出他的裤腰带，收走他的香烟。这时，他开口说：“能把香烟给我吗？”工作人员严肃地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之后，邱会作坐在床边没再吭声。在我转身起步要离开的瞬间，他站了起来，点头向我示意，我也向他摆了摆手。

至此，我为期五年三个月零六天的保健任务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 原载《军休之友》2014年10月号

~~~~~

【当事者言】

“休闲江青”与“毒药事件”

• 周淑英 • 赵柳恩 •

◇ 养狗、骑马与摄影——“休闲江青”

周淑英（以下简称周）：养狗也是江青“休息脑子，转移一下”的内容之一，她说狗最忠诚于它的主人。她养的狗是从部队农场选来的，都不是名犬。江青起名叫“小黄”的狗养的时间比较长。狗从农场进了楼房也不习惯，在楼里地毯上拉屎撒尿。江青到17号楼看电影也带着狗，那里地方大，狗在哪儿拉、尿，人们也不知道，每次都是闻到臭味才找到打扫。搞卫生的同志很无奈，处理地毯上的狗便真是窝囊死了。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那养狗吃的就是从食堂拿来的东西？

赵柳恩（以下简称赵）：主要吃她剩下的饭菜。楼里人也从食堂给它带点儿剩饭。江青不允许别人喂，她要掌握对狗的饲养权，对此我有段刻骨铭心的经历。1971年的一天江青吃饭后让我把她的剩饭留起来，等她开会回来再喂。我把剩饭放在楼外门口用碗扣好。江青回来喂狗时发现饭没了（其实是小黄溜到门外吃光了），非说是我喂了。别人告诉她我睡觉了。“睡觉也把她叫起来！”我实际上没睡，我哪儿可能睡啊？就在大厅进门那地方，她就问我：“你是不

是喂狗了？”我说没喂。“那为什么狗食没有了？”我说我放在门外面可能它饿了就吃了。“你肯定是喂了！”就开始喊起来了。接着气势汹汹地让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站成一排，把狗抱到远处突然放开，看狗跑向谁，以验证谁喂了狗。江青这是让狗指认人，小狗不但没跑，反而转过身对着江青摇尾巴。气得她把狗这么一下抱起来，“你不是喜欢小狗吗？”啪，就扔到我身上了，“你跟它一块儿给我滚出去！”

周：江青恼羞成怒，深夜2点就要赶小赵走。她说：“小赵喂狗讨狗的喜欢，这狗我也不要了。把小赵和狗一起送到农场，让她和狗住在一起！”还要立刻就走，说不走她睡不着觉。侍候江青入睡后当时已是深夜，我离开江青卧室哭着回到门厅，把江青的话说了一遍。大家对江青的做法很气愤，可敢怒而不敢言。老杨和大周商量并请示汪主任后，悄悄把小赵藏到17号楼的一个房间里。之后我和大周去看望小赵，她一个人孤独躲在房间里，委屈和屈辱使她泣不成声。大周还把半导体收音机拿给她听，希望能缓和一下她的情绪。

赵：约一周后大家看江青气消了就说农场都是男战士我在那儿不方便，江青也感到一个护士不够用，这才同意让我回来。这事报告了汪东兴，他让我先去农场一趟熟悉那儿的环境，以防江青问起农场情况我答不出来。之后秘书开车带我去农场转了一圈。我重新回到10号楼后，江青并没有询问农场情况，也没说一句合乎人情的话。

周、赵：我们曾戴着红领巾在阳光下成长，受的都是正面教育，江青的作为令我们非常愤慨、不解。论职务她是政治局委员，我们是普通党员；论年纪她是长辈，我们是小辈。她经常迫使我们做违心的自我批评，而她却肆无忌惮不受任何约束。真是欺人太甚，公理何在！

周：除了养狗，江青还喜欢骑马，这与在战争环境中，马是主要交通工具有关。她有一张1939年在延安，由斯大林摄影师罗曼·卡曼拍摄的她骑在马上回眸一笑的照片：她穿着军大衣，头发是两边编好用丝带束在头后，骑在马背上，身体前倾，回头那么一笑。那年她25岁，很年轻。她非常欣赏那张照片，翻印了不少送人。江青兴奋地讲起战争年代的一些事，她说她骑的马很通人性，一叫“马儿”它就乖乖地走过来，从不摔主人。夜间行军时马绝不嘶叫甚至连响鼻都不打。

江青想到了要骑马，就从部队借来几匹训练有素的军马。她看到马以后，情绪显得特别欢快，温和地抚摸着马的颈部背部。她骑术娴熟，50多岁的人，在左脚放进脚镫后能一跃上马。在大草坪骑了好多圈。她还教工作人员骑马技术，如脚掌只能前1/3放在马镫上，脚进去多了到脚踝处就危险了，摔下来脚被马镫挂住人就会被拖死；拉马缰绳使马行走变慢，拉紧马就会停下来；两腿夹紧马肚子，马行走速度会加快至奔跑……讲解后她让警卫二处和身边工作人员都骑一下，结果二处一位警卫人员从马上摔下来，腰都摔伤了。江青还支起三脚架拍照，她也给我照了一张骑马的照片，她设计了我背着药包，骑马在奔跑。因为马跑得快，照片上的人有点虚。第一次骑马我很紧张，在照片上都能看出我害怕的样子。这次我看到了江青从没有过的好心情，感到骑马对调整她的情绪是有效的，也就是她所要求的“转移”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她又找回年轻时骑马驰骋在延安土路上的感觉。

赵：她去颐和园（那时颐和园等许多公园都不对外开放，群众是进不去的）、八达岭，也带着马去。有一次她竟要在颐和园的长廊里骑马，警卫员急忙劝阻：“那可不行！磕了脑袋怎么办？”她才作罢。江青去北戴河和其他地方，也常带着马。马是挂在火车后边一节运货车厢带去的。江青去定陵时参观了展馆，当天我们两人和其他随员都在场。她只是观看了展品，没有像有人说的她把凤冠戴在自己的头上，对此应说明真相。

李：周老师，说到江青给您照过相，她照相可是行家啊。

周：江青很喜欢摄影，她给身边工作人员和许多领导都照过相。她说当年在苏联养病时，

医生为了使她的情绪稳定，建议她用听音乐、摄影来调节生活。从那时起她开始学摄影，曾请石少华当老师，给她指导。她拍照前要先用测光表测参数，用光十分讲究，如顶逆光、侧光，有时还要使用滤光片。摄影数据都要做详细记录。

赵：江青总叫小周给她记录光圈、速度等数据。

周：她喜欢照花卉。有一次她照迎春花，还为这张照片题了一首诗，那意思就是这迎春花啊比较低贱，不是高贵的花，就像一个小丫头一样，不被人所重视，但是很坚强。她说这个挺像她的。

李：是旧体诗吗？

周：我能看懂，不是旧体诗。后来她又到景山、北海等公园拍牡丹、芍药，还让我们往花上滴水，制造露珠的效果。

有一次在天坛，到了那花房一看呢，有很多兰花，公园负责人介绍说有些是朱老总养的兰花（朱老总喜欢养兰花，但是文革中，好多兰花都送给天坛公园了）。江青看了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养那个”，很快就出了花房。《月夜哨兵》《提高警惕》都是在钓鱼台夜间拍的。拍摄对象是警卫二处干部和警卫战士。江青既要突出人物又要顾及月亮，所以用光很讲究，除了主光还采用了辅助光，相机打开B门，深夜用了几个小时才拍好。那期间她发表照片所用的笔名是“峻岭”或“大海”。

赵：江青还照过西郊机场、杨村机场的飞机飞行表演，叶群和那“四大金刚”（整理者按：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去了。她照相的花费也不少，如购买进口胶卷、照片放大冲洗和相纸费用等。为了还钱，经主席同意从他稿费中拿出些钱来。毛主席有不少好照片都是她照的，有些公开发表过。

周：从洗印出的照片和发表的照片来看，江青的摄影技术还是比较高的。一些内行的人也是这么认为，我看这是有原因的。

一是摄影器材好。相机是德国造的，胶卷是伊斯曼的，灯光是从新华社借的，洗印照片在新华社。这些在当时都属于顶级器材和最好的技术。

二是老师好。石少华、吴印咸以及毛主席身边的摄影师都是国内一流的，由这样老师亲自讲授指导，是提高技术极好的条件。

三是江青照相时很专注，白天光强取景时用蓝色丝绒布蒙着头和相机，时间长了头发都被汗水湿透了。她也很讲究用光技巧，采用顶逆光、侧逆光、侧光等，在小样片印出来后，她把每张小样片与拍摄参数进行对照，以利于提高技术。还在小样片上画出取材范围，再拿去放大洗印。

四是拍照选材内容丰富又特殊，如庐山仙人洞、海南岛高炮阵地、西瑁岛女民兵、海军快艇乘风破浪、空军机场腾空的飞机、景山公园里的牡丹和芍药……江青有她得天独厚的条件，她可以进入军事要地要求高炮发射，进入机场拍摄飞机腾飞，进入文革中尚在关闭而老百姓不能进的公园拍花卉。在那个年代这一切全国只有江青能办得到！其他人，哪怕技术再高超的摄影师也无能为力。

五是工作人员配合得好，按江青的要求我们动手摆放灯架，打出主光和辅助光。至于花和叶片上的露珠，也是我们细心地滴洒。有时人手不够，警卫二处的人也一起干，时间长了配合得也都熟练了。像《提高警惕》中的警卫战士，深夜趴在草丛中，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坚持配合了好几个小时。

周、赵：1971年，江青还吩咐把钓鱼台17楼的一个房间布置成照相室，摆上照相设备给许多人照相。我们目睹了江青为林彪拍摄《孜孜不倦》的全过程。1971年夏天，江青邀请林彪、叶群到钓鱼台照相。几天后叶群来了，她说：“让江青同志久等了！林副主席感冒来

不了，您就给我照吧。”江青先在室内给叶群照，然后又到室外拍。叶说：“我眼睛小，不上相。”江建议她往前上方看，镜头仰角拍。叶群见到照片后很高兴，说照片上她眼睛大了，人也年轻了，是她一生最好的照片。

6月初，林彪过来照相。他下车时，被帽子大衣包裹得很严实，还用毛巾捂着嘴和鼻子。他告诉江青前几天身体不好没能来，还夸江摄影是内行。

林彪的胡子很长，在叶群再三劝说下才刮净胡子。江青先用测光表在林彪面前测光，又让他双手捧着《毛选》做阅读的姿势，江青手握快门线，低头看取景器，刚要按快门，突然抬起头来说：“一大疏忽！快摘帽子，在室内学习，哪能戴帽子？”林彪迟迟不愿摘，江青说：“要拍得真实些嘛！”一边亲手摘去林彪的帽子，而林彪是很不情愿的表情。在这二三十平方米房间里江青采用了她照人物最喜欢用的顶逆光，江青认为这样用光人物轮廓好、面部光柔和。林彪姿势是低头看书，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不戴帽子的林彪。灯光下，他的头皮坑坑洼洼，有几根稀疏的毛发。事后我们两人私下议论：林彪在战争受过伤怕受风，公开场合从未见他摘过帽子。全中国也只有江青才能在林彪本人不情愿的情况下摘掉他头上的帽子！我们还清楚地记得林彪离开17号楼时，出大门也和江青一样是面朝里倒退着出去的。

这张江青署名“峻岭”题为《孜孜不倦》的照片，发表在1971年七八月份合刊的《解放军画报》和《人民画报》上，在全国广为发行。江青精心导演并为林彪拍摄的这张照片，是“九一三”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前最后一张半身免冠照。这两件事，时间间隔仅3个月零4天。

九大以后江青曾邀请陈伯达来照相，她还主动与陈并排照了两人合影。当时陈伯达显得很勉强，在场的人也都很诧异。事后陈伯达私自取回照片处理了，江青得知此事大发雷霆，把陈伯达和图片社的人大骂一顿。

江青平时尽管称陈伯达为“老夫子”，实际上对他并不客气，经常拉着脸训斥他。陈伯达书呆子气很重，不注意生活细节。有一次来11号楼时把大衣挂在衣架上，那衣架很大，可以挂好几件大衣。他从会客厅出来，穿上一只袖子就走，差一点儿衣架就倒在身上，幸亏警卫员手疾眼快扶住了衣架。

◇ 惊动政治局的“毒药事件”

李：江青的不好伺候是出了名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经常突如其来地发火，而且辱骂工作人员，您能具体描述一下吗？

赵：比如到大会堂的车上，她常骂：“你这混账东西，走之前为什么不提醒我上厕所？闹得我现在这么紧张，都出汗啦！”

周：“呀呀呜”是江青常说的一句上海方言，意思是“不中用”，说这话仅表示她不满意，但还没动怒。她生气时会说“制造感冒”“制造混乱”“起到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等等。

赵：她常说“你们用软刀子杀人”。发怒时说“你给我滚”，而我们不能走也不能动，要老老实实站那儿听她训。她训够了，再一次说“滚”时才能离开。她还侮辱护士是“花瓶”，说“要在旧社会像你们这样工作早被开除了”。

在那里工作，一个礼拜里如果有一两天没有挨骂，你会觉得日子真是太好了！没有哪天她那个嘴是闲住的。

让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是发生在1972年春天的一件事，其起因是江青吃药。前面说过，江青每天晚上分7次服用镇静、安眠药。除此以外，在她卧室的床头边上还准备有3杯药，如果睡眠不好，半夜醒了她自己喝一杯，睡不着的话再来第二杯，再睡不着加第三杯，这都是医生给她安排的。本来是备份的意思，但是她不吃的时候简直是太少太少，几乎是每次都吃完3杯，因为她睡眠就是不好。那天，她把3杯药都吃完了，到早上7点钟左右还没睡着觉，她就打铃叫我，说“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说那怎么办呢？她说“晚上我那3杯药你没给我摆”。我说我给你摆啦。“你撒谎！”我说我没有，我真的给你放了。“你再给我拿一杯药来！”我心想

再拿一杯药来，就等于多加了巴比妥一类的药了，我怎么敢做主？她非要，没办法，我就打电话请示吴阶平大夫，大夫同意加药。江青吃了这次药后还是没睡着（我觉得她那段时间心里有事），就说“我不睡了，起来”。你想想谁吃了安眠药以后不睡觉，起来是不是要头晕？正常人都头晕。她一头晕起来就说：你给我吃毒药了！让我把所有她服用的药写出来，药名、剂量等。我列出药单交给江青，她看了一遍。来到17号楼放映大厅旁的小厅。然后叫来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就把这药单又交给徐业夫：“我的护士给我吃毒药害我，请你把这个药单交给主席！”当时徐业夫就一个劲“嘿嘿”地笑，徐秘书是位老红军，他毕竟在主席身边待的时间长，也了解江青的做派。江青说：“你还笑！我的护士给我吃毒药，你还笑！”徐业夫就不言声出去了。他走后我们回到大厅，江青接着问，“是不是周淑英让你给我吃的毒药”？我说“她没有叫我给你吃毒药”。“不对，就是周淑英叫你给我吃的毒药！”我说小周不可能叫我给你吃毒药。“那你不是她带的？”我说我承认是她带我的。“那不就她叫你给我吃毒药吗？”我说她带的我，但不可能教我给你吃毒药啊！“你现在说还不晚，因为你是胁从犯。”我说“江青同志，确实周淑英没有叫我给你吃毒药”。“你还不老实？你敢保证？”我说“我敢保证”。“拿什么来做保证？”我说“党性”。她说：“你还说党性！你这个不老实的东西！”上前“啪，啪”撕扯下我的帽徽和领章，“你不配戴这个帽徽、领章！”一把摔到地上。我也没动，就在那儿站着。她又琢磨一下说：“哦，这是宝贝，不能扔地上。”又捡起来揣到她口袋里面去。这是在17号楼大厅东门发生的事，当时警卫员大周（整理者按：指周金铭）在场。

我作为一名解放军干部，从参军之日就视帽徽、领章为国家、军队的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江青近似疯狂地撕扯动作并把我敬重热爱的帽徽、领章狠狠地摔到地上时，我惊呆了。我受到侮辱，我犯了哪一条国法军纪？被她撕扯去象征军人尊严和重任的帽徽、领章，只因我说了句真话！我心中愤怒，凭什么江青可以肆意对日夜为她服务的人大施淫威！我感到无助，没想到她会做出如此举动，更不知道她下面要采取什么手段整治人！那时我才20多岁，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想豁出去了，她爱干吗就干吗吧……之后我不说话，泪在眼里打转，忍着不让她流下来。

接着江青擅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她要审讯工作人员。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听汪东兴说过他当时不同意江青的做法。江青说是“审讯”，汪说“那叫问话，政治局怎么审讯一个工作人员呢”？而江青一口咬定就是审讯。汪主任只好电话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17号楼。

17号楼大厅成了“审讯室”，江青是主审官。她半夜三更叫来8位政治局委员，企图让他们成为“陪审团”。总理先来了，接着来的是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一共8位。厅内有一个长条桌子，江青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坐在桌子北面，江青旁边是周总理，叶剑英在顶角那儿。我、警卫员大周和杨秘书在桌子南边，我与江青正对面，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的。

江青诬陷我给她吃了毒药，还说是小周指使我干的。她时而声嘶力竭地咆哮，时而咬着牙紧闭着嘴唇，脸上的肌肉在抽动，真是凶极了。我如实陈述，坚决否认了她的栽赃陷害。

江青逼问警卫员、秘书要他们证明她吃的药是毒药。他们说：吃药都是由医生征求你的意见，你同意了。我们也不是医生。到底怎么吃，我们也不清楚。

问完以后江青就把我写的那张药单子递给总理了，总理想把事情平息了，他说“她能写出这单子来就挺不错嘛”。江青拍着桌子冲我喊：“你给我吃毒药，你还敢不承认？”后来叶帅问：江青同志，我想问一下什么是毒药啊？江青说：安眠药就是毒药。叶帅说：你可以不吃吗？江青说：不行，不吃我睡不着觉！叶帅说：那你不能少吃一点？江青说：少吃也不行。叶帅见她无理取闹，就走到一边，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总理看到江青这么飞扬跋扈，我的帽徽、领章都被江青撕去了，那次是真发火了，他气愤地对江青说：“你对她态度好一点好不好？她还是孩子啊！……你把这么个小女孩的帽徽、领章都撕下来了，我都替你难过！”面对江青的恶劣行径，总理忍无可忍发了脾气：“你对她客气点好不好？你这样对她，她那么紧张怎么让她说话啊！别说她紧张了，我都紧张啦！”当时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在现场，是江青叫他进来的，说：“你是张大夫吧，你也进来听听，受受教

育！”总理就喊：“张佐良！我紧张啦，我已经紧张了！赶紧给我吃片非那露！”只有周总理发怒说出来的话才能压一下江青嚣张的气焰，其他人就看着，都不说话。

江青当时下令，把她放药的保险柜和所有吃的药都贴上封条封上。她吃的药、喝的水都不让我送了，停止了我的工作。（封完后汪东兴就开始警觉了：她封自己的药柜可以，千万别把中南海门诊部的药房给封了，那样中央这些领导就别吃药了，就没法运作了。据原药房的老药剂师说：汪东兴当天就来到药房，要求将药房的药送去检测，并立即加强了药房的安保措施。检测结果证明所有药品中无任何异常成分。）

江青当晚还要把曾替她治好牙病的301医院口腔科专家洪民、曹家信抓起来。还要抓309医院干部杨洪喜，他曾是颐和园的军代表，江青游园时接待过她。江青急于和林彪、叶群划清界限，不惜一切手段陷害无辜的人。当然总理没有听她的，坚决地抵制了她。

江青擅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她亲自审问为她服务的护士、警卫员、秘书3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其权力之大、级别之高是史无前例的。面对江青穷凶极恶的审问，我坚持实事求是地回答。之后，屈辱、无辜、惊吓和愤怒使我木然站在那儿。领章被扯后，红色缝线还耷拉在军服领子上，我就不拽下来，就让那根红线那么垂着。这时周总理走到我面前握紧我的手，他语重心长地安慰我说：“小赵，我本来准备今天跟你谈谈，但是因为我外事活动，没法跟你谈了，你要想开一点。”总理还说，“要看在毛主席的份上”。总理真诚的目光、亲切的话语、有力的双手给了我力量，我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泪如泉涌！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几十年后再次提起，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仍使我心有余悸。有次我在305医院遇到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她说：我爸爸说“江青那个护士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

周：小赵讲述的这些事，我虽没在现场却有如身临其境。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江青权力之大，正如我曾听到江青在各种场合毫无顾忌地说：“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赵：江青停止了我的工作，可她生活一时都不能离开护士——因小周走了，就我一人上班。她让总理想办法，总理只好让他的护士许奉生先过来。当时是周总理的警卫员高振普给许奉生打的电话，说总理叫你马上到钓鱼台来。许奉生就害怕了，以为总理病了。她说总理怎么了？高振普说总理没怎么，叫你来，江青要用你，许奉生开始不相信……

周：因为1968年江青重感冒时许奉生已经来过11号楼了。工作几天后江青就让她回去了。

赵：对。这次让她到钓鱼台来是真的，当时我正在门口“待罪”，目睹了这件事的始末。许奉生知道江青难伺候，不愿意到江青这儿工作。从中南海过来时一路都流着眼泪，进17号楼时眼睛已经哭红了。看到她进来以后，高振普说：“你的眼睛这么红，这样怎么行啊？赶紧去洗手间用凉水洗洗，要不然进去以后让江青看见了，可了不得了！”她就赶紧去洗，洗完以后去见江青。进去一会儿许奉生出来了，笑着出来的，高振普也愣了：怎么啦？她就说：“她嫌我的手太凉啦，她说她不要我了。”许奉生撒腿溜着门就出去了，赶紧跑啊！她一点儿也不想在这江青那儿待着了。

周：江青也曾诬陷我给她吃的药是毒药，可吃了“毒药”既没中毒身亡，也没出现中毒症状。她以莫须有的罪名关了我一年多。事实是几年里我悉心护理她，从没出过任何差错。江青的头发一直都是浓密、乌黑油亮。由于她在不同场合多次控诉护士给她吃毒药造成头发干枯，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使人误以为是慢性中毒使她头发掉光而戴了假发套。当时赵柳恩在江青疾言厉色逼供的巨大压力下敢讲真话，为我申辩，太不容易了！我敬佩她的人品，也珍惜我们的战友情。

赵：江青这人就是疑心重，她曾经问我：“你为什么叫赵柳恩？”我说：“我的名字是爸妈给我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我明白，我籍贯是广西梧州，出生在柳州，父母希望我记住柳州对我有养育之恩。江青有个毛病，喜欢给人改名字，她说把你这个名字改了吧，你就叫“赵柳”吧，要不就叫“赵恩”。我说改起名字来手续挺麻烦，最后没改。她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啊”。“九一三”事件出来以后，她就把我和林彪家的事联系起来了，说“怪不得你要记住柳州的恩情啊！因为林彪的母亲葬在柳州”。开始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后来我一琢磨，我这名字跟林彪的妈妈葬在那儿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瞎怀疑嘛。

1973年的春天汪东兴到10号楼，警卫员大周让汪东兴留下来。他气愤地说：“我们一只脚在监狱里面，另一只脚在外头，天天就是这种心态。”大家围拢过来替小周鸣不平，说小周是被江青陷害关起来了。我们同汪说：“我们现在吃不好也睡不好，经常做噩梦。江青是什么政治局委员？马列主义对别人不对自己！”汪说：“我原以为你们还是孩子，看来你们都长大、懂事了，这个事你们放心。”

我曾多次听汪东兴叙述当时的情形。那天汪东兴和周总理到毛主席那儿汇报：“我刚从10号楼来，那儿的工作人员心情可不稳定啦，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主席问为什么，他就把小周的事说了，主席立刻就火了：“还有这个事？她从哪儿抓起来的给我放回哪儿去！”毛主席下了指示，当天就把小周放出来了。毛主席还说：“她那个地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好好地出来的。”“他们在那儿工作，她不但不关心不爱护不帮助，出来以后还扣上大帽子，从她那儿出来没有一个好好安排工作的。”主席还对汪东兴说“你保他们嘛”，汪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权”！主席说：“我当你的后台老板嘛！”主席还叫汪写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名单保留下来。大家都想离开江青那儿，可是想走也走不成啊！如果允许大家5分钟内离开这个楼，门马上会被挤破，大家都要跑，一个人也不会留下。

◇ 护士结婚风波

赵、周：我们受了委屈就向程师傅诉说，忍不住时就哭一鼻子。他同情地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在这儿也干了好几年了，怎么给她干也没有好下场。我看没有一个人能好好地离开这儿的，赶紧结了婚就走吧。我们男的没办法只能在这儿待下去。”实际上不结婚你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条路能离开她，你绝对不敢提出来：我要离开这儿，我不想在这儿干了。那不自找倒霉嘛！

赵：为我结婚的事儿，江青居然能闹到政治局会议上去。那时候我在江青身边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年龄也不小了，一直没交男朋友。江青曾说过：“不要太眼高了，（警卫）二处这么多小伙子，你就从二处找一个嘛！”后来我和二处的小张（整理者按：指张云生）交往了一段时间，彼此相处不错，开始谈婚论嫁。我特意选了个江青心情好休息得还可以时，对她提出我想结婚的事。并表示：“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您要同意了我就办，不同意就不办。我服从组织安排。”她说：“娃娃，我同意。哪有不同意的？在九天庙外（钓鱼台北门对面）找间房子你们就办吧！”这是我记忆中江青唯一一次称我为“娃娃”，透着一种长辈的亲切（因为不习惯，我还愣了一下）。

哪想到才过几个小时，晚上要到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又发火说：“我要不同意呢？”我说：“您不同意那就再说吧，我服从组织安排。”她从卧室走到大厅时又问我：“结婚是你提出来的还是你对象提出来的？”我一听她口气不对，怕她迁怒于小张，就说是我提出来的。“我不相信，一般都是男的主动，女的不主动。”我坚持说是我提的。“真是你？”她站起来瞪着眼狠狠地盯着我，一步步走近，突然朝我胸口“咚”地就给了我这么重重的一拳！她吼着：“你不要脸！”还说了许多侮辱我的极难听的话，今天在这儿我都没法说。我当时就傻了！又气愤又委屈，没想到她这个政治局委员对我张口骂脏话，抬手出拳打！出来后我告诉了在门口值班的王振荣（整理者按：江青所住楼的警卫战士），他同情并出主意说：“你真傻，当时你就该躺在地上打滚，说‘打疼了’。”我说：“我不会呀！没有哪个政治局委员像江青这样对待工作人员的！”紧接着，在去大会堂的车上江青就一路叱骂我。逼问：“你的对象叫什么名字？”我怕牵连男友就一句话不说，她还就此逼问警卫员。那天中央政治局在福建厅开会，她在会上

大吵大闹：“批林批孔，我在冲锋陷阵的时候，我身边的工作人员竟然提出男婚女嫁，搞家中坛罐罐的事。我的护士结婚，就是要拱掉我的一个炮腿……”还说了许多不堪入耳和侮辱人格的话。她当时就逼汪东兴处理我的男友。汪主任从会议室出来，看到我说：“你呀你，怎么这时候提出结婚的事，也不先向我报告？”我说：“我看她心情好时才提这事，如果报告你怕牵连组织而引起不好的结果。我个人的问题由我自己承担。”汪主任说：“她让我出来处理解决你们的问题，叫小张到西藏去。但是你放心，我不会动你小张一根毫毛的。”江青提出让他去西藏，他后来到底去哪儿了我并不知道。一天江青问我：“你的小张到哪儿去了？”我说不知道。她说：“不会失踪吧？”我说没有人告诉我他去哪儿了。事后汪问我：“你为什么对江青说小张失踪了呢？”我根本没说过这话，是江青自己说的。我只说确实没人告诉过我小张的行踪。江青就是这样出尔反尔，将她说的话，硬扣在别人头上。我们俩结婚的事就拖下来了，拖了一年。

张云生（以下简称张）：那天警卫局邬吉成副局长给我打电话，说：“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一会儿邬就从大会堂开来一辆白色伏尔加车。当天晚上就把我送到中南海警卫局一处东边的那个小屋。里面放杂物，一个乒乓球案子上全是土。我对邬局长说：“江青是什么政治局委员？我犯哪一条法了？按婚姻法规定我们年龄早超过了。你觉得不合适我们就不结婚嘛，干吗非要闹成这个样子？还大闹政治局！”老邬说：“这些组织上都知道。”

第二天汪主任就把我和邬吉成叫到他的办公室。汪主任说：“小张，不要紧张，今天你就去广州，西哈努克的母亲在广州小岛住，你去那儿做警卫工作。”邬吉成让我赶快走，今晚就走，当晚我没告诉小赵，转天自己坐火车去了广州。

我在广州住了三个多月。之后西哈努克的母亲来北京，我又在那儿工作一年多。我与小赵经历了各种磨难终于在我回京一年后结婚了。

赵：江青后来对我说：“我知道你个人的问题我没给你处理好，你心里面有点儿怨言。你放心，我现在找人呢。”就找了马晓先来替我。我走了以后才一两个月，有一天程师傅到我家里去，说：“老太太问你有没有孩子？怀孕了没有？她想让你回去上班。”我说你告诉她，我现在感冒了，不知道是怀孕还是感冒。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我本来身体就不好，那时瘦得就没个样。再说，当时经济条件也不好，我本不想马上要孩子。现在听江青这么一说，吓得我“算了吧，赶紧要个孩子，只要怀孕她就不会叫我去”。就这样有了女儿。即使这样，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她还叫我去替了一次班。我蹲下为她穿鞋时，她说：“你呼吸怎么这样重啊！”嫌我侍候她不灵便，又让我走了。

张：这期间，江青还到处打听我。汪东兴怕我在西哈努克母亲那儿工作，被江青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又把我送到了江西五七干校。我在江西五七干校又待了一年半。中间只回来过一次。

赵：快生孩子的时候，他才回来探亲，没出满月他就回去了。我怀孕、照顾孩子还要坚持工作，一个人太难了。长夜的那串泪珠流到枕头上……

周：1971年为我结婚的事江青也动了大怒。江青那段时间身体状况还好，在兴致勃勃逛远郊公园、骑马后没有任何不适。我想在这工作4年了，年纪也不小了；再说小赵也能独立工作了，她心细、温和，对江青护理那套复杂程序也掌握了。当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江青当时是同意的，态度还算温和。哪知刚过几小时我就接到要立即离开10号楼的通知。事后听同事们说江青她突然翻脸，她怒火中烧指责我在她为革命呕心沥血的时刻，竟为个人的区区小事离开她，就是对她没有感情。她还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并说再也不想看到我，让我马上滚出10号楼。我就这样离开了10号楼。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又要我回去工作，我重新回到10号楼。原来我离开那段时间江青去青岛疗养，在使用便盆时歪倒了，造成一侧锁骨骨裂，她需要我回来继续伺候她。一见面她板着脸说：“你犯了大罪，你为结婚离开了我，看！看！我这儿骨折了。

从今天起你要戴罪立功护理好我！”从那一刻起，我真成了待罪之身。虽然每天都小心翼翼伺候着，但她百般刁难，常无缘无故地冲我发火。想到前面一些同事的遭遇，我又一次收拾好个人物品，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江青的惩罚。

赵、周：人们一般赞美结婚的词语都是美好、甜蜜、幸福，并受到大家的祝福。然而我们这些为江青辛苦服务多年的保健护士，却因江青的干涉、责难、谩骂，使结婚充满了担忧、苦涩和泪水。这些痛苦和眼泪只能往自己肚里咽。

李：天道好还，报应不爽。我听说张老师您后来参与了抓捕“四人帮”？

张：是，我和高凤利两人，亲手抓的姚文元。就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东侧那个厅。高凤利是守在门的东侧，我在西侧，姚文元一进门，我们就从两边走上去，一人抓一只胳膊，给他来一个“缠臂压肩”！他愣了一下后就“哎哟哎哟”地叫，呼喊他的警卫员。随即，我们把姚文元押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面前，他宣布了中央对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

周：也没反抗？

张：反抗啊！从怀仁堂东侧那个门出去，走到海边有个小亭子的地方，他说了一句话：“你们为邓小平翻案！”我叫高凤利，“把手绢掏出来，塞住他的嘴！”他才安静了。

李：姚文元这么敏锐，当时就联想到“为邓小平翻案”的问题？

张：他就喊了这么一句。到地下还比较老实，到后来又有一次反抗，装痴卖傻。我们在地下室待了6个月零4天哪。最初爱人都不知道，以为我失踪了，那时任务是保密不能讲的。半个月洗一次澡，洗完澡再拉下去。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可以回家一次，也是车接车送。地下隔离室有两个沙发、中间一个茶几、一个沙发床。卫生设备齐全。姚文元就在这么一间房子里活动睡觉。那时候这一组就4个人，有我、高凤利、康海群和师职干部滕和松。24小时守着姚，两人一组两班儿倒。他躺里头，我们这两人必须得看着他。值班时不能打瞌睡，太困了咬嘴唇也不管用，掐大腿根的肉也不管用。没办法就抽烟提神。中间有一次，姚文元装痴卖傻，往外跑。那时候人一急了眼也不知道有多大的劲儿，我抓着他的后衣领子“，噌”，把他从门口一下子摔回到沙发上。我跟他讲，党的政策你是明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老老实实的，我们不能把你怎么样，你不老实那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现在两个人看着，我们是干什么的？你能跑出这屋去吗？后来他老实了，再也没往外跑。

李：那他整天干什么呢？

张：看书啊。他自己要《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看完了以后换。平时就在那沙发上坐着，困了就睡，再一个起来溜达溜达。整天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交谈，最多就是他要点儿什么东西，比如纸啊、笔啊、书啊。我们写个报告，上级批准的物品就给他拿来。他的头发长了都是我给他理。里边生活设施挺好，厕所所有洗澡的地方。

李：这“四人帮”你们心里猜得都非常准确吗？

张：非常准确。1976年10月6日那天正好我值班，那时候警卫团改成警卫师了，副师长一开始叫高云江出去，接着又叫黄介元出去。人员出出进进的，我们都看出今天要有大事，一会儿又叫我这个参谋。实际上武健华、汪东兴的秘书在一起，决定参加行动的人选。人员确定后就分组由汪主任谈话。谈话在中南海南楼他的办公室进行。他谈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闻到火药味儿了吗？”我们都说闻到了。他接着说：“有人要搞‘四人帮’，你们能猜出是哪些人吗？”我们心知肚明，但没说出来。我们经常接触这些人，哪几个人经常在一起活动都很有数的。

汪说：“那好，今天晚上你们就去执行一个任务，具体布置听武健华的。”武健华在布置任务时，指定我们这一组的负责人是警卫一处的滕和松。

李：那时您知道要抓谁吗？

张：这个任务交代很清楚，就抓姚文元。成卡车的部队都集结了，看起来形势很紧张。警

卫团里有我、李广银、黄介元、高云江、吴兴路。交代的任务是我们这组负责抓捕姚文元；高云江和黄介元组负责抓江青；李广银组负责抓王洪文；纪和富组负责抓张春桥。

李：作为警卫人员，原来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的，当然也包括王、张、江、姚。突然有一天接到命令：对某几位中央首长下手。这个弯儿怎么转？

张：这个弯子好转，他们4个人背后搞小动作。借批林批孔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大家都看的很清楚。

赵：我们对总理的感情都挺深的。后来总理身患癌症，身体消瘦十分虚弱。这几个人还不择手段地整他，我们心疼总理，对他们的行径十分气愤！

张：就我个人讲，那就更好转了。知道为什么吗？

李：直接受迫害？

张：对！因为我们两人提出申请结婚的事，小赵被江青打了胸部一拳，把我从警卫二处赶走。接着还要把我弄到西藏劳改。组织上为了保护我，让我离开北京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此外，对江青平时的所作所为对我们深恶痛绝，所以从内心拥护中央的决定。

□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